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4年第7期
（总第24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文化部关于加强流动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杨志今：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关键在基层和农村
动态关注
■《北京蓝皮书》系列发展报告发布
■2014移动互联发展大会召开
媒体聚焦
■电影《归来》热议继续　历史记忆问题成焦点
■从端午节看民俗传统的传承
尖峰观点
■张向军：中欧城镇化进程的共性及差异
■陆　铭：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
海外视野
■“非凡英国”：国家形象营销的英国样本
■韩国政府推出第二个文化产业振兴计划
研究院之声
■我院重大项目“京沪港台四城文化政策比较研究”开题会举行
■我院邀请Fabio Lanza教授开设系列讲座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关于加强流动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覆盖，提高城乡基层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近日，文化部印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流动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认为，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原有设施落后、设备陈旧、布局分散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各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建成。但是仅仅依靠固定文化设施，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特别是农村、偏远山区、牧区和海岛等地方地广人稀，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不少盲区。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有利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有利于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提出，加强流动文化服务工作，要按照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要求，突出政府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以健全基层流动文化服务设施网点为基础，以城乡基层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群众为服务对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活动、人才和信息等各项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建共享。加强流动文化服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面向基层，按需提供；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到2020年，流动文化服务要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常态性工作，公共文化机构配备与需求相匹配的流动文化服务设备，流动文化服务网点基本健全，区域文化交流广泛开展。

《意见》还提出，要完善流动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基层文化服务网点建设；配备流动文化服务器材设备；强化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流动服务职能。要创新流动文化服务运行方式。推动流动文化服务标准化；建立流动文化服务供给目录制度；推动流动文化服务社会化。要丰富流动文化服务内容。依托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数字文化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要培育流动文化服务品牌。实施流动文化服务政府示范项目；培育流动文化服务行业品牌；打造流动文化服务社会品牌。要健全流动文化服务工作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实施流动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加强流动文化服务经费保障；为流动文化服务提供人才支持；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据文化部网站，2014年6月4日)

(2)政策解读

■ 杨志今：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关键在基层和农村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指出，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仍然薄弱，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水平仍然较低，效能不高的问题普遍存在。解决好上述问题，重点在基层和农村。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典型经验，按照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突出重点，针对薄弱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整体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一是以协调机制为平台，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统筹。今年3月，文化部牵头成立了由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1家成员单位参加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下发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工作方案》。各省文化部门根据实际，也要积极推动本地建立由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依托协调机制的工作平台，理顺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格局，优化分工协作。

二是以制定保障标准为重点，加快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标准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支撑。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组成立会上审议通过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工作方案》，并明确为建立协调机制的重点工作任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保障标准。主要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保障责任和财政支出义务。二是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等技术标准。这是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机构、人员工作方法、程序、职责范围以及行为操作所进行的统一规定。三是工作评价标准。主要是衡量考核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服务的实际绩效。

三是以消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盲点和薄弱点为突破口，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针对贫困地区，文化部正在研究起草《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并计划于下半年召开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针对农民工聚居的城乡接合部，应落实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推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开放，保障好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权益。

四是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增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力。一是推进公共文化单位改革，探索县乡基层公共文化单位改革的路径和办法，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制定政策、调配资源、实施监管、营造环境上来，探索将财政投入以直接拨款为主转为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基金制等多种方式，形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从文化系统“内循环”逐步转为面向社会的“大循环”。

（据中国经济网，2014年5月30日）

■ 阮可：流动文化服务应高效运行

流动文化服务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弥补了服务缺口，扩大了服务半径，进一步保障了基层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从本质上来看，流动文化服务和数字文化服务一样，都是固定文化设施功能的拓展和延伸；从效果上来看，对于地广人稀的地域，流动文化服务的覆盖比固定设施的覆盖更经济。文化大篷车、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等流动文化服务形态，把优质的文化资源输送到基层，盘活了各地文化存量，对于文化输入地而言，又是新的文化增量，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

流动文化服务不仅可以向下流动，同样可以向上流动。带有浓郁乡土气息、民族特点、民俗特色的“文化进城”，可实现文化反哺，与“文化下乡”双向互动，并打破一些地区的“文化孤岛”现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

想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流动服务能力，首先要推进其标准化建设。要建立流动文化服务网点建设标准，明确公共文化机构特别是基层服务网点在场地、功能和设备配备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建立流动文化服务内容标准，明确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开展流动文化服务的对象、范围、种类、数量和质量要求，形成流动文化服务规范，推动流动文化服务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

其次，要提供相应的文化菜单目录。围绕读书看报、参加文化活动、进行文化鉴赏和看电影看戏等重点内容，建立流动文化服务资源库，创作生产一批形式多样、符合基层群众需求的文艺作品，设立流动图书目录、文化培训讲座目录、文物和美术作品展览展示活动目录等，并储备一批能够经常参与流动文化服务的各类文化艺术人才，确保流动文化服务资源充足，并可持续开展。

再次，是要建立相关评价机制。要建立流动文化需求征询、群众满意度测评、群众评价及反馈机制。各级公共文化机构应设立供需对接平台，通过网络、群众信箱等多种方式收集群众文化需求，根据需求确定流动文化服务的种类、数量和时间安排，通过新闻媒体、服务公示栏等向社会公布，便于群众选择，逐步实现高效流动、精准服务。

（据《中国文化报》，2014 年 6 月 4 日）

2. 动态关注

■《北京蓝皮书》系列发展报告发布

6 月 9 日，北京市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北京蓝皮书》系列发展报告，共发布包括《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3 至 2014)》在内的六个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北京的公共服务已初现世界城市雏形。

蓝皮书从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六方面，对本市 16 个区县的公共服务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东城区(0.7900)、西城区(0.7189)、门头沟区(0.6986)、延庆县(0.6902)、朝阳区(0.6487)

和石景山区(0.6476)。蓝皮书指出，尽管本市各级政府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高度，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但基础设施人均占有量仍偏低，特别是资源、能源、环境、交通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支撑人口增长。报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和人口过度集中在核心城区；教育、医院、体育文化等基础设施过度集中在核心区，也从客观上加大了人口膨胀、产业过度集聚、交通拥堵等压力。

此外，蓝皮书还提出了开凿“京津陆海运河”的总体设想：西起北京通州宋庄，经河北香河，天津宝坻区大口屯、大唐庄，再经宁河县乐善庄，最后到达滨海新区，在蔡家堡入海。蓝皮书提出，“京津陆海运河”可通过运河引入海水，通过海水淡化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提供水资源，解决北京水资源不足的困境；通过运河引入海水，也能改善北京的大气环境；此外，通过运河航运，还可以打开北京的直接出海口，发展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航运事业和海洋经济。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6 月 10 日）

■ 2014 移动互联发展大会召开

6 月 12 日至 13 日，2014 移动互联发展大会暨第五届中国手机应用开发者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本次大会以人民日报全新客户端上线仪式开幕，举行了移动媒体论坛、移动大数据论坛、移动营销论坛、移动终端与渠道论坛、移动金融论坛以及中国手机开发者应用开发者大会、中国游戏渠道与投资价值峰会等 13 场丰富多彩的活动。

同时，大会还发布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和特征亮点。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 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 8.38 亿，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渗透率达 67.8%；手机网民规模达 5 亿，占总网民数的八成多，手机保持第一大上网终端地位。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全民时代。2013 年，“互联网 +”成为热词，传统行业纷纷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联姻”。从报刊、网站到医院、银行，从读书、教育到娱乐、购物，几乎各行各业都在试水移动客户端。移动互联网在突破时空限制上为社交带来了质的飞跃，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沟通、交流、分享。移动互联网使网络、智能终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得到整合，建立了新的产业生态链，催生了全新的文化产业形态。阅读、游戏、音乐等文化产业借助移动互联网进行了融合创新。

（据《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12 日）

■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年度目录公布

商务部、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5 部门近日联合公布了 2013—2014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目录。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366 家企业入选重点企业目录；海外华文书店营销网络计划、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 123 个项目入选重点项目目录。重点企业目录中既

有图书进出口公司、出版社、发行企业，也有印刷厂、新媒体公司。和往年一样，北京依然是入选新闻出版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仅重点出口企业数量就超过 25 家。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目录中。

（据文化部网站，2014 年 5 月 28 日）

■ 2014 中法文化高峰论坛在巴黎举行

当地时间 6 月 6 日，应法国文化部邀请，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法国。其间，杨志今会见了法国文化部秘书长让 – 弗朗索瓦・科兰。双方就中法建交 50 周年，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并出席了 2014 中法文化高峰论坛开幕式活动。作为中法建交 50 周年重要文化项目，2014 中法文化高峰论坛是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框架下，聚焦中法思想、文化交流的特别文化活动。论坛由中国文化部主办，数十位中法专家围绕创意和传播、母语和翻译、传统和当代、社会发展和艺术创作、时尚设计和市场、人文出版和文化误读、思想和知识等话题展开了对话。

（据《中国文化报》，2014 年 6 月 12 日）

■ 2014 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江西景德镇举行

6 月 14 日，由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文物局、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4 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景德镇市举行。本届主场城市活动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开幕式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致辞中表示，文化遗产不能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应融入社会、惠及民生；努力展示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工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他充分肯定了景德镇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中做出的努力，认为景德镇市下大力气保护利用好“老窑址、老厂房、老街区”，探索出了一条城市建设和文化特色融合、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共赢之路。

（据中国广播网，2014 年 6 月 14 日）

■ 四部门启动“剑网 2014”专项行动

6 月 12 日，国家版权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版权执法监管工作座谈会，正式启动第十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剑网 2014”专项行动从今年 6 月持续至 11 月，将以打击网站未经授权大量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侵权行为作为重点任务，并通过规范网络转载行为，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机制，以净化网络传播环境，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全国“双打”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房爱卿在讲话中表示，全国“双打”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今年的“双打”工作中，将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案件咨询、线索通报受理反馈等制度，推动侵权假冒行政处罚的信息公开，促进相关执法与司法信息共享。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 年 6 月 13 日）

■ 文化金融俱乐部成立 为文化和金融搭建合作平台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和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共同发起的“文化金融俱乐部”16 日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主题为“开发性金融与文化建设”的首期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陈元出席并致辞。陈元表示，文化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和迫切需要，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成立文化金融俱乐部的目标，就是建立文化与金融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文化和金融高效对接；以开发性金融引导和组合各类社会资源，推动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推动形成多方合力，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据介绍，“文化金融俱乐部”将着力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着力打造文化金融信息平台，通过政策传导、信息服务、理论研讨、项目对接等方式举办多种务实活动，协同国家开发银行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文化企业提供“融资、融智、融商”服务。

（据《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17 日）

■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伦理学研讨班”

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代表性人物，著名学者李泽厚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伦理学研讨班”，并与多名学者展开“哲学对谈”，吸引了众多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关注。研讨班包括 4 次活动，5 月 9 日开班，李泽厚声明不讲演，围绕正义、公正等话题与学生进行对话。5 月 21 日举行的“哲学对谈”由李泽厚、陈嘉映、杨国荣、童世骏展开对谈，郁振华主持，话题包括哲学是什么、哲学为什么重要、哲学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等。

李泽厚认为，哲学是一种意见而不是知识，也不是信仰，哲学起的是一个启发的作用，其含义要靠自己体悟。对于“道德有没有进步”的问题，李泽厚说：“我认为生活是有进步的，历史是有进步的，道德的进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还表示，明确反对只有谈精神世界才算哲学，他把吃饭哲学作为一章的题目，认为哲学最终还是归结于生活。

（据华东师范大学网站，2014 年 6 月 9 日）

3. 媒体聚焦

■ 电影《归来》热议继续　历史记忆问题成焦点

编者按：电影《归来》已经热映一段时间了，大量评论从先期讨论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得失，渐渐转向从电影本身出发，讨论当代历史的记忆与失忆问题，特别是电影中

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作家周泽雄提出，原作提供了一整头优质肉牛，足以让真正的艺术大厨大展身手，编导却硬生生变成一出“感动中国”的温情小品。虽然取自小说结尾，但《归来》对该部分的尊重，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归来》中的大量再创作，不仅胡编乱造，还对原作从精神到艺术，程度不等地构成了抹杀，表现出对于那个时代的美化。比如，严歌苓没有提供婉瑜在车站与丈夫接头的情节，所以，让婉瑜当着众警察面高叫“焉识，快跑”的愚蠢设计，只能由编导认领。该创意告诉观众，在那个黑暗年代，婉瑜如此对抗官府，竟然是一件零风险的英勇。婉瑜日后依然被左邻右舍亲切地叫成“冯老师”，没有受到丝毫追究。陆焉识保留了满满一箱未曾寄出的信件。那等于把劳改犯的私人空间放大了一百倍。编导放弃原作中涉及劳改的内容，那是权利，但通过画蛇添足的编造，将劳改犯人的境况暗示得过于美好，仿佛他们的囚床就像病床那样还配有一只床头柜，就过分了。更大且更违背常理的美化是，劳改犯人陆焉识展现出的身心健康，直追阳光少年，仿佛二十余载的劳改生涯，不曾给他带来丝毫阴影。在小说结尾，年逾八旬的陆焉识迫于儿子和新科女婿的声威，仓皇出逃，带着亡妻冯婉瑜的骨灰，也许将重回青海湖边的大荒草漠。而在电影中，陆焉识活生生被弄成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中国好人”，影片在两位老人的深情相依中，徐徐幕落。两种处理，两般认知，还需强调优劣吗？将家国灾难、人性和生命苦难用一组芭蕾小狐步舞曲转型为轻盈的个人心理疾病，当真算得上一种再创作？（据周泽雄：《“归来”中的迷失》，《南方都市报》，2014 年 6 月 5 日）

还有人发现，张艺谋从《山楂树之恋》开始采取一种新的重述历史或拯救历史的方式，即用一种无法被遗忘的旷世之恋把曾经异质性的、病态的“文革”时代纯洁化，变成与当下时代没有本质差异的空间。同样的爱情逻辑在《归来》中也成为重要的情感支撑。从冯婉瑜对陆焉识的信言听计从，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每月 5 日去车站接陆焉识，这种张艺谋电影中特有的“一根筋”背后是冯婉瑜对陆焉识如此深厚的爱，而陆焉识冒死偷跑回来最大的动因也是为了看冯婉瑜一眼。这种纯洁的至爱成为跨越“文革”时代与新时期等不同时代的文化策略。值得追问的是，这种痛彻肺腑的爱为何最终无法化解冯婉瑜内心的郁结呢？这恐怕与去历史化的历史书写建立在对历史的刻意拒绝和规避上有关，使得这部看似涉及“历史”的电影却像患上了一种文化失忆症。这部怀旧色彩浓郁的电影也没有使用常见的闪回镜头来交代过去的历史，除了“文革”结束所标识的时代转折，历史在这部电影中仿佛停滞了一般，就连同样风云激荡的 80 年代也没能吹进三口之家的平静生活。影片中，陆焉识恰好需要用过去的历史来“激活”冯婉瑜的记忆，可是在陆焉识朗读过去的信件中，既没有劳教生活的苦难和残酷，也没有他们美好恋情场景的回忆，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述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张慧瑜：《〈归来〉的文化失忆症》，《南风窗》，2014 年第 12 期）。

也有人对《归来》的意义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唐小兵认为，《归来》的意义在于，

它将几乎被遗忘或者强制遗忘的历史重新召回，将当代史上的失踪者或被侮辱被损害的个体记忆，重新带回到这个消费主义当道的时代。不管这部电影在呈现历史时有多大程度的避重就轻，它的意义却尖锐地凸显了出来，它把人带入一个关于当代史的记忆与遗忘的主题。正如《归来》所彰显的那样，“失忆”并不意味着个体性的苦难真的可以完全从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抹除，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它始终在一个阴暗的记忆黑洞中沉默着，等待着被召唤，被认真地对待，被迟到的历史正义抚慰。就此而言，《归来》貌似是一种无望的漫长的呼唤，却可能在当代人的心灵生活中寻觅到明亮而温暖的呼应(唐小兵：《召唤当代史沉默的失忆者》，《南风窗》，2014 年第 13 期)。

■ 从端午节看民俗传统的传承

编者按：*端午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联系着很多独特的民俗。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节日习俗正被现代消费习惯改变。如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俗，留住浓浓的文化乡愁，成为人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一些人为传统节日民俗的失落和过度物质化而担忧，提倡多开展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有人指出，端午节虽然成了法定假日，但是这几年对端午节的重视，都集中在赛龙舟和吃粽子上，端午民俗越走越形单影只。传统民俗的传承需要进一步挖掘内核，让最有魅力的因子全部都释放出来(据蔡华锋：《传统民俗的传承需进一步挖掘内核》，《南方日报》，2014 年 6 月 4 日)。还有人指出，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和外来文化的渗入，传统的节日习俗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一些东西正逐渐演变：做龙舟不再是神秘的祭祀，而变成了商品化生产；粽子不再是长辈的手艺，而变成了大工厂流水线生产并裹上了真空包装；菖蒲、艾叶不再家家皆有，却化作了汨罗江畔鲜见的风景……在许多地方，端午节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了些物质，少了些文化。留住传统习俗，是为了留住背后的精神内核和民族血脉，如端午节的意义之一在于纪念伟大的屈原，纪念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据袁汝婷：《端午不应简化成“粽子”》，《福建日报》，2014 年 6 月 3 日)。有人进一步指出，人们对节日的需求主要是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情感价值才是节日最主要的核心，一旦被物质占了上风，过节反而会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失落。没有精神内涵的节日看起来愈热闹，在人们眼中就显得愈单薄(据陈俊：《放慢脚步才能重拾节日记忆》，《重庆晨报》，2014 年 6 月 3 日)。针对上述情况，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黎传绪指出，不能把对于文化的传承变成肤浅地发展“节日经济”。年轻人是传统民俗的重要传承者，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更具体验性、更具时代感的文化活动，来激发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的热情(据徐蕾：《民俗传承应与时俱进》，《南昌日报》，2014 年 6 月 6 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端午节庆现代化是必然的。现代生活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日趋城市化的生活形态，类似文化仪式很难人人参与。但是，吃本身却包含着

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应该乐观看待吃背后蕴藏的文化传承动力(据任小康：《舌尖上的端午也是文化传承契机》，《湖北日报》，2014 年 6 月 3 日)。还有人指出，现代商业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是一种必然，我们不必太过忧虑，要相信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现代商业的力量，也未必如想象中那样战无不胜。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商家围绕着中秋、端午大肆吆喝月饼和粽子的时候，这未尝不是对传统节日的一种宣传(据苑广阔：《传承好端午节所寄寓的家国情怀》，《福建日报》，2014 年 6 月 3 日)。另有论者指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节日本身的游戏性、互动性并不相悖，当代人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兼容并举，不断吸收现代文化因子，改变传统中过分讲求中庸、封闭、内敛的文化性格，用现代价值观重塑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营销方式(据《挖掘内涵，让端午节“活”在当下》，《新京报》，2014 年 6 月 2 日)。

4. 尖峰观点

■ 张向军：中欧城镇化进程的共性及差异

如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欧洲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走过了 200 多年的历程。1950 年，欧洲的城镇人口比重就已达到 50%；现在，欧洲城镇化率已达到 80%。与之相对，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 52.6%，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然而质量不高，真正“人的城镇化”只有 34% 左右。中国与欧洲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有：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问题；推进城镇化需要的资金；农业人口转移带来的就业问题；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和保障问题；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中国与欧洲城镇化进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社会转型任务不同。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需要解决双重任务，实现双重转型。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发展转型。这两种转型处于重叠和胶着状态，会产生更多的矛盾，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复杂。二，资金来源不同。中国城镇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收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这是解决原有矛盾，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要选择。相比之下，欧洲解决城镇化的资金来源则另有途径。欧洲国家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攫取了高额利润。“二战”以后，欧洲国家以城镇为单位，建立城镇公共建设投资基金，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提供启动资金，坚持市场化、透明化运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三，政府主导模式不同。中国城镇化是政府垂直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欧洲各国政府更注重市场机制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完善以及城镇化的以人为本属性。四，人口转移规模不同。这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性所在。其一在于地域规模广阔，其二在于人口转移规模庞大，其三在于中国独特的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五，

经济增长的认同模式不同。尽管我国已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但在实践中仍充斥着大量粗放式、高能耗、拼资源的发展模式，那种“增长就等于发展”的观念依然很有市场。表现在城镇化当中，就是要追求建设大城市，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复合中心，造成一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太多太集中，各种配套设施跟不上。

欧洲城镇化道路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欧洲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就已颁布了社会保险法案。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运行，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格局，避免出现城市“病态”凸显而乡村衰落萧条的两难困境。以就地城镇化为主导。欧洲城镇化的特色在于改造农村，而不是致力于大城市的扩张和建设。就地城镇化的前提不仅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留得住人口，提高由农村改造后的小城镇的吸引力。突破制度藩篱，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并不只是将农村户籍变更为城镇户籍、将农村更名为社区那么简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逐步通过改革来突破制度藩篱，实现有产业支持、福利供给及社会保障的农民市民化。可持续的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城镇的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要与城镇化的规模相适应。如果没有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配套跟进，不仅会导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还容易造成新旧居民之间的矛盾。以人为本，因时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城镇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

（据张向军：《中欧城镇化进程的共性及差异性研究》，《人民论坛》，2014 年 6 月 12 日）

■ 陆铭：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当中形成的问题(比如城市病)是在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城市长大的过程中，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很多人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和城市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其实，这样的观点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比如，在国际上很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大都市，它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而其交通拥挤问题并没有持续恶化，而环境污染经历的是一个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这说明，城市病并不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简单地概括如下：第一是分享效应，大家往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集聚的时候，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得到分摊。第二个效应是匹配效应，生产者和劳动者在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越容易各自找到相互匹配的对方。第三方面是城市内部的学习效应，一方面是向周围的人学习；另一方面是不断积累各种经验。

当前，最重要的争论已经不是城市化的水平或者速度问题，而是在哪城市化的问题，是在东部城市化还是内地城市化，是否需要控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镇发展?我的看法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必须跳出城市化本身，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路径。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结果，就不能像美国这样通过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之间人均 GDP 的差异。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中国今天的问题跟欧洲非常像。中国是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货币，但同时，也有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情况。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每个省的人均 GDP 就会趋于一致，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上海人均 GDP 几乎是贵州的 7 倍。人民币的汇率反映的是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汇率相对于内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来说是偏高的。这样，内陆地区难以出口，再加上地理劣势形成的更高的运输成本，出口困难会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为本地居民获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资源，而自己通过发展经济所获得的资源又不够，于是就会产生强烈的借债冲动。

要走出这样的怪圈，要实现持续有效的增长，中国必须消除市场分割，促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而内陆地区未来就像美国的内陆地区一样只能专业化于本地有优势的产业，从而减轻其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仍将向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少数都市圈集聚。站在这个高度看城市化的路径和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才能看得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据陆铭：《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东方早报》，2014 年 5 月 16 日）

■ 曹和平：京津冀一体化规模远大于洛杉矶崛起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洛杉矶周边的 15 个县渐成一体。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京津冀在过去 15 年间也开始步入一体化进程。京津冀一体化很可能在 21 世纪中叶，在地球东部，重现当年的洛杉矶崛起，同时使我国东部发展更加均衡。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涉及 50 余个县，经济整合规模或达 1.5 亿人，其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洛杉矶崛起。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大国事件。

事实上，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已经提出 10 余年了，但一体化进程一直较为缓慢。原因在于京津冀地区的政治经济学竞争。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城市与城市互相排挤，城市间的结合变得很少，城市间的竞争是政治经济学的授权竞争而不是产业体系的竞争。因此，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要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就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授权、确权、放权同时进行。政府在授权时要相对集中，如果不集中，京津冀三地将面临“谁指挥谁”的问题；同时，需要设有一个专业团队从中运作，明确确权给谁，否则粗放式的规划将无法执行；最后，要把市场资源配置越过行政疆界的权利还给京津冀统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学部门，而不能掌握在政治经济学

部门。

（据曹和平：《京津冀一体化规模远大于洛杉矶崛起》，《中国科技信息》2014 年第 8 期）

■ 胡大平：新型城镇化：从“增长机器”到文明形态

城乡一体化或新型城镇化理念，是对以“增长机器”为核心的单向度城市发展实践的替代。它把城镇化过程理解为生活空间再造和文明形态创新过程。

首先，传统城镇化实践的根本问题在于把城市贬为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没有将其视为新文明的平台，甚至新文明的形态。城市实际上承担起了增长机器的职能。其次，须从文明发展而非城市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城镇化过程，进而定义新型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不是传统工业化－城镇化之自发过程，而是以城市为平台创造全新生活方式的过程。城镇化涉及的不是城市规模、形态这些技术细节，而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创新这个大问题。再次，新型城镇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接受城市是现代生活基本空间这一前提下，以城镇化过程为核心来重组中国的现代性，探索一条新文明之路。我们必须在自己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出有关城镇化的历史诗学。

城镇化涉及的是自然、社会结构和人本身的综合性历史变迁过程。它并非如假想的那样是经济的或自然的过程，从而表现为技术问题，而是真正的人的生存艺术问题。城市并非简单地意味着一种空间的物质形态，也非经济活动的舞台。实际上，它亦是社会的公共机构，以及更深刻的，它是一个特定共同体文化创造和忠诚（认同）的发源地。如果城市问题是现代性的中心问题，那么我们将以此问题为中轴，一方面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另一方面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注入新的经验。

（据胡大平：《新城城镇化：从“增长机器”到文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6 月 6 日）

■ 赵弘：北京应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摊大摊厚”

在现行财税体制与 GDP 考核导向机制大背景下，全市、各区县、街道甚至乡镇、村发展经济动力十足，而经济发展必将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从而吸引大量就业人口集聚，而就业人口的集聚又产生更多的生活性消费需求，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又将带来更多的人口集聚，造成首都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为支撑更大规模城市的运行，又需要更强大的财力支撑，进而又不得不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口集聚，对资源环境带来更大压力，陷入循环累积的发展“怪圈”。多年来，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与首都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受制于国家现行财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摆脱“通过扩张经济规模来增强财力，进而支撑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思路。

首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矛盾与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导致首都人口过快增长；存在大量与城市功能定位不匹配的低端产业；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功能等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加剧了城市运行管理压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区县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些规划或

项目，从局部或者全市发展经济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从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角度看未必合理。

以经济调控为突破口，主动降速、提质发展，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控经济增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缓解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有效手段。一方面，要明确各区县差异化的产业定位和发展重点领域。另一方面，要确定各区县应当坚决淘汰退出的产业目录清单。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要“疏堵结合”，一方面限制中心城区的再开发，禁止大型公建项目、商业项目、商品住宅项目等的开发建设，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摊大”和“摊厚”，避免人口、产业等功能向中心城区再集聚。同时，要积极引导中心城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大型公交枢纽等搬迁，推动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向城市“副中心”“新城”疏解。另一方面，引导城市发展重心全面转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此外，还要加快大容量、网络化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补上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的“短板”和“欠账”。

（据章轲：《对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北京应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摊大”“摊厚”》，《第一财经日报》，2014 年 6 月 12 日）

■ 唐小兵：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

青年处于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昂贵的房价、医疗和教育的系统压迫，更承受着单一的成功价值观的压迫。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什么都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景观：这是最牢骚满腹压力重重的一群人，但同时又是最生机勃勃地在奋斗，其实也就是变相地支撑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压迫机制的一群人。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都浓缩在青年群体的心灵之上，可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性。不是活出时代的矛盾，而是学会遗忘时代的所有矛盾，活在时代的表层并浅尝辄止于其中，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

这种状态之形成，自然有着很深的社会因素。我想就其大端而言，有两个历史脉络对青年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且远。中国的崛起依赖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此前我们总津津乐道于城市的兴盛，如今我们才开始注意乡村的溃散和凋敝，尤其是乡村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中如何安顿的社会问题。从一个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青年群体本来就需要面对一种生活上的不确定感甚至不适感，那么消费的自由、物质的共性，似乎在提供一种“共同语言”甚至安全感，现代人的自由也就成了去政治化的消费的自由。这样一种青年文化培育出来的心智，往往对他人的痛苦缺乏一种感通的能力，而对于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相关性也缺乏一种体认的直觉。这种青年文化崇奉的是赢者通吃的成功哲学，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各种资源，而最少地承担对社会的公共责任。

我不愿意将青年文化的特质就简化成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主导的亚文化，其实造成当前这样一种相对同质化的青年文化现象，还有一个更为历史化的脉络，就是在 90 年代以后，公私领域的分离和对峙。一方面是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性的公共领域被系统地压抑，政经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等大问题开始淡出中国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另一

方面，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越来越开放，欧风美雨乃至日韩潮流一波波汹涌而入，五光十色的消费文化以时尚的名义席卷中国。当世俗生活通过娱乐、广告、影视、服装、游戏等展现出了一种精致美好的可能性时，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为之奋斗了。但这种私人生活领域的奋斗，又与面对公共议题的犬儒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就孕育了一种奇特的青年文化：一种顺从性的奋斗精神。

（据唐小兵：《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文化纵横》，2014 年 6 月）

■ 潘祥辉：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及其政治效应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演变，“新媒体”也在不断进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新媒体使用具有一些中国特色，最为明显的是它的泛政治色彩。在西方充当社交工具的私人属性明显的网络应用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媒体属性的东西，以至“众声喧哗”：网络爆料、人肉搜索、舆论监督、公共启蒙、参政议政等都借助于新媒体得到呈现。

分析互联网之于中国政治社会的影响，需要回到对新媒体属性的基本认识。新媒体首先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存在的，从这种媒体技术的发生发展来看，它有两个属性：一是商业属性，二是政治属性。这两个属性相互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从新媒体的经济属性去观察其政治后果，对于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规制有所助益。

新媒体赋予了我们两重身份：客户身份与公众身份。前者属于经济学范畴，可以称之为经济身份；而后者可以纳入社会学或者政治学范畴，是一种政治身份。新媒体服务意识远甚于传统媒体，其与传统媒体强制灌输不同，坚持“服务客户，满足客户”的宗旨。新媒体这种服务客户、鼓励参与的架构和理念，在满足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培育了用户的一种消费者主权意识和自由、平等、参与的理念，赋予了客户以知情权和选择权。通过客户的身份转换将之接进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一旦客户脱离了单纯的经济诉求，他就可能变成政治领域的公众。这种新的需求反过来会促使新媒体企业的创新。新媒体的商业属性是原发性的，第一位的，而其政治属性其实是商业竞争的衍生物，或者说是一种市场溢出效应。

互联网技术已经部分地推平了信息自由流动的藩篱，正在创建一个更加开放、平等、民主的商业环境。这种技术变革的政治后果我们无可消除，因为互联网商业化必然产生溢出效应。随着互联网垄断格局的形成，政府治理与互联网公司正在走向合作而不是对抗。互联网之于社会的负面后果我们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对互联网的监管还将继续，而互联网的创新也不会停止。最终，新媒体的形态与功能会稳定在一个商业与政治的平衡点上。

（据潘祥辉：《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及其政治效应》，《文化纵横》，2014 年 6 月）

5. 海外视野

■“非凡英国”：国家形象营销的英国样本

近期，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文化、媒体与体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共同举办“创意是非凡的”招待会，庆祝英国创意产业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数据显示，创意产业是英国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每年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超过710亿英镑，解决就业人数超过160万人。事实上，“创意是非凡的”只是英国国家形象推广计划“非凡英国”的一个分支计划。“非凡英国”由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于2011年9月首次提出，2012年2月正式启动。该计划的初衷是借伦敦奥运会之机扩大旅游影响，提升国家形象和竞争力，由于推出之后取得了良好效果，逐渐延伸为一个长期的全球性国家形象推广计划。

“非凡英国”国家形象推广计划致力于宣传英国形象的丰富性，重点推介英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遗产、乡村、音乐、体育、购物、美食以及与商业投资相关的创意、创新和知识等优势要素。“非凡英国”计划的重点推介对象是全球9个国家的14个重要城市，通过户外广告、地铁广告、电视、网络等渠道进行深度推广，受众面达9000多万人。该计划还特别注意了社交媒体的重要作用，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Flicker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并建立全球官方网站、电视频道发布信息。

“非凡英国”国家形象推广计划自推出以来得到了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2012年，财政部向该计划拨款2500万英镑，该计划在2013年至2014年的费用被增加至3000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也通过该计划的成功实施获益匪浅。一份独立评估报告显示，在2012年至2013年的国家品牌指数中，英国位列全球第11，上升2位。该计划产生的经济回报也十分可观。数据显示，“非凡英国”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产生了超过5亿英镑的经济回报，预计在2013年至2014年，各项经济回报将达到6亿至8亿英镑。

（据郑苒：《“非凡英国”：国家形象营销的英国样本》，《中国文化报》，2014年5月29日）

■ 韩国政府推出第二个文化产业振兴计划

近日，韩国政府审议并通过了第二个文化产业振兴三年基本计划。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将推出五大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一是创造投融资及技术条件。2014年，韩国政府将设立2000亿韩元规模的文化产业类型基金以及1000亿韩元规模的韩国数字内容基金，并计划将文化产业基金的融资规模不断提升，以此进一步刺激文化产业的民间融资，推动小型文化企业的成长，加强对创意企划的支援。为适应创意经济时代进行制度改革，更加注重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培育，为地方民众更好地享有文化成果创造条件。

二是培养创意人才，鼓励创业。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文化产业输送人才，韩国政

府将进一步支援名为“Contents Korea Lab”的项目。为鼓励创业，韩国政府还将对在文化创意领域创业的公司和个人提供场地、法律等支援，并将为部分文化产业领域的求职者提供4至5个月的实习机会。

三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军海外。韩国政府将全球文化产业市场划分为新兴市场(南美、中东和非洲)、成熟市场(亚洲)和重点市场(英国、欧盟)。为推动韩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军全球市场，政府将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提供商务、市场及周边一系列活动的支援。此外，还将对海外市场进行调查并提供当地市场方面的综合支援，建立法律方面的海外进军协议会，强化著作权的保护。

四是促进著作权产品应用。为了加强著作权产品的管理，将建构综合著作权管理制度。为提高公共著作权产品应用的便利性，将建立公共资源活用支援中心。并将进一步强化著作权的相关教育活动，提高民众的著作权意识，同时，进一步推动弱势阶层享有文化产品。

五是增强文化产业的综合实力。通过进一步推动广播电视、游戏、电影等韩国文化产业领域强势产业的发展，保持文化产业持续的增长态势和竞争力。通过对音乐、动漫、音乐剧等具有潜力的文化产业领域的支援，消除文化产业不同领域两极化发展的态势。通过对数字出版、国际时尚以及其他综合类文化产业的支援，进一步提升数字文化产业市场的竞争力。

该计划称，三年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到2016年，希望韩国的幸福指数能够从现在的全球第41位上升到第30位；韩国文化产业将为社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预计到2016年，从业人数将达到66万名；文化产业也将进一步成为韩国的国家品牌，希望到2016年韩国能够成为世界排名前十的文化强国。

（据宋佳烜：《推产业振兴计划 韩国要做文化强国》，《中国文化报》，2014年6月12日）

6. 研究院之声

■ 我院重大项目“京沪港台四城文化政策比较研究”开题会举行

6月6日，我院重大项目“京沪港台四城文化政策比较研究开题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举行。我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潘世伟，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原司长王永章，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童怀，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李建盛等出席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设想，并对课题的研究成果寄予厚望。会议由本课题首席专家、文学所副所长荣跃明主持。

研讨会上，课题组四位专家围绕课题研究框架做了专题发言。与会专家就文化政策

制定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当前城市文化政策存在的问题、城市文化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城市文化政策的特色和差异、文化政策的社会参与度、文化政策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未来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

■ 我院邀请 Fabio Lanza 教授开设系列讲座

近日，我院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系教授 Fabio Lanza 开设“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与空间经验”系列讲座。Fabio Lanza 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社会史、都市文化、城市空间等。

该系列讲座主要分析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文化、空间和影像表达，就多部电影如《北京 55 日》《阳光灿烂的日子》《骆驼祥子》《青春无悔》等进行讨论。6 月 15 日，Fabio Lanza 教授还带领学生来到前门大街，实地考察了北京传统城市空间在当代的变迁，从建筑、居民、器物、职业等方面考察了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中西文化冲突，并深入探究了空间重建、文化怀旧与当代消费文化的关系。

（本期摘编人：王丽媛、丁玥澍）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